

“‘交融与碰撞：青铜时代的吴越文化’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江苏省吴文化学会 苏州博物馆

2017年6月27—29日,由江苏省吴文化学会、苏州博物馆联合主办的“‘交融与碰撞:青铜时代的吴越文化’学术研讨会暨2017年江苏省吴文化学会年会”在苏州博物馆举行。苏州博物馆馆长陈瑞近研究员,江苏省吴文化学会理事长王奇志研究员,南京博物院邹厚本研究员,江苏省文化厅副厅长、南京博物院院长龚良研究员先后致辞。

邹厚本先生在致辞中对吴文化学会的下一步工作提出了指导性要求。吴文化学会的研究工作既要关注“死人”,也要关注“活人”,学会要努力复原古代社会的面貌,在调查总结的基础上制订今后一段时期的规划,引领吴文化研究进入新阶段。如:确立区域内商周考古的文化序列与谱系;加强聚落形态研究,梳理以往的重大课题,如古城址的研究、宜侯矢簋的研究等;根据学科的发展制订新的课题,如部族迁徙、文化交融在考古学上的反映;开展跨学科、跨地域的交流,等等。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伯谦先生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良高研究员分别作了主旨报告。

李伯谦先生首先以历史文献记载为依据,从吴越两国的来源、世系、族系以及吴、越、楚三国的关系系统梳理了吴越的历史;然后从两个方面介绍了吴越遗存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民国时期的吴越史地研究会揭开了吴越文化研究的序幕,1949年以后的考古工作踏上了科学发掘的道路。吴越文化有五大历史贡献:(1)土墩墓对中原坟丘墓产生的影响;(2)有格带箍圆首青铜剑的发明;(3)东周青铜镰的发明;(4)“鸟虫书”的发明;(5)印纹陶与原始瓷的发明。吴越地区的这五项

创造发明最终都深刻地影响了中原地区的文化,吴越地区对华夏地区文化的发展壮大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当代人要继续继承发扬吴越文化创新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

徐良高研究员则从文献文本与考古发现的角度解读了吴国历史叙述的构建,认为疑古学派“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历史观对于研究古代文献中吴国历史叙述的形成、演变过程具有启示意义。文献出现的时间越晚,夫差之死的事件过程就越生动、越详细,越具有故事性,人物也越来越多,而且地点、人物、情节也往往与早期版本不同。西周早中期吴国的政治中心应在宁镇地区,而不在苏州、无锡地区。要认清文献记载的文本属性,正确处理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的关系;在研究吴文化时,应该要考虑到吴文化的分层、分组问题和不同文化因素的来源问题,即外来强势文化因素影响和自身文化传统的传承问题,而且要从集体历史记忆建构理论的角度,理解古代文献中的吴人“自述”与“他述”在开始阶段存在差异而后来趋向一致的现象。

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等考古文博机构的7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着出土文献与吴越历史研究、吴越考古新发现、青铜器研究等展开了讨论与交流,为会议带来了24场精彩的研讨发言。

一、出土文献与吴越历史研究

清华大学中文系李守奎教授介绍了“清华简”《越公其事》,并结合《越公其事》探讨了吴越史中的几个重要历史问题。(1)勾践灭吴故事的流传与多个文本的形成。《越公其事》较之《国语》

中的《吴语》、《越语上》、《越语下》三篇对勾践灭吴的叙述有自己的特点,其表述方式、细节叙述、对历史人物的态度都有不同之处。(2)历史的故事化与故事的历史化。历史记载变成历史传闻,不断被故事化、小说化,同一故事可以形成不同的文本,可以说是历史的故事化。从故事化倾向而言,可以大致排序为:《左传》、《越公其事》、《吴语》、《越语上》、《越语下》,越往后故事性越强。(3)夫差为什么不追穷寇?《越公其事》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详细记载了这个求成与许成的过程,在目前所见先秦文献中最为详备,与《吴语》、《越语上》、《越语下》的记载出入也很大。(4)休养生息与有所作为。根据《越公其事》记载,勾践在兵败国破后,并没有立即施政作为,而是经过三年的休养生息,才开始逐渐实施“五政”。(5)“五政”之治与越国之复兴。《越公其事》对于越国兴起的过程与经验进行了分类总结和概括,再以时间的次第分别叙述,既有政论的特点,又不失记事的本体。(6)“鸡父”之再现。《系年》中出现了一个历史文献失载的人物伍之鸡,又称伍鸡,伍鸡其人在《越公其事》中再次出现,综合“清华简”两篇史书中关于鸡父的叙述,可以获得许多重要的历史新知。

清华大学历史系刘国忠教授介绍了“清华简”《系年》:已整理出版的《系年》简一共有138支,记载了西周初年至战国前期的历史,不少记载为传世文献所未有,或与传统看法不同;时代很早,“清华简”抄写时代约为公元前305年,没有遭遇秦始皇焚书之厄,保存了先秦古籍的原貌,属于国宝级的奇珍;数量众多,“清华简”总数约为2500支,是迄今发现的战国竹简中数量最大的一批,内容异常丰富;意义重大,“清华简”全部都是古书,以经、史类典籍为主,内容极其重要,许多书籍的价值可谓空前。“清华简”《系年》的发现,使学界对于齐长城的修建时间、齐越的关系都有了新的认识。

“清华简”《系年》、《越公其事》发现后,相关的研究工作都有了进一步的成果。本次会议上,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燕生东教授探讨了“清华简”《系年》所载越国在山东地区的活动及相关问题。“清华简”《系年》篇的发现,为了解越国在山东地区的活动提供了很好的文献材料。《系年》所记齐、越战争及其所反映出来的越国进攻路线及势力范围的变化,对了解越国在山东地区的活动及其迁都琅琊的问题也有很大的帮助。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陈民镇博士通过对战国竹书“上博简”《吴命》和“清华简”《系年》、《越公其事》研究,分“吴楚相争”、“吴越争霸”、“山东时期”三个部分解读了吴越历史。

湖北省随州市博物馆项章副馆长对随州出土的三件(套)楚、吴、曾国青铜器及其相关问题作了补充研究。通过将《左传》、《史记》及近出“清华简”《系年》的记载,与随州出土“楚王熊章铸钟”、“S形纹鼎”、“曾侯與编钟”等青铜器的研究相互结合,他得出三个方面的成果:其一,厘清了春秋晚期吴、楚、曾(随)三国错综复杂的政治地理关系;其二,进一步勘正了文献记载的随国即铜器铭文中的曾国,曾、随为一国两名;其三,文献中关于“即进击随”战争场面的记录与“S形纹鼎”和“曾子义行簠”的出土地相吻合,证明吴、随两国发生过激烈的战斗。

二、考古新发现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宫希成研究员通过对安徽漳河流域周代遗存的分析研究,分享了他的几点认识。(1)漳河流域周代的考古学文化因素构成较为复杂。一方面,总体特征上与苏南、浙北地区有很多相近之处,同时与赣江流域、安徽江北地区有较多的联系;另一方面,又具有很强的区域性文化特征,出土器物风格独特,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2)漳河上游又是周代铜矿遗址分布的中心区域,已发现规模庞大的铜矿开采和冶炼遗址数十处。已发掘的铜陵木鱼山和南陵江木冲、刘家井、西边冲等处,发现采矿井、炼铜炉等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的遗迹和冶炼产品冰铜锭,反映出此时的冶炼技术已经较为成熟。(3)土墩墓、聚落遗址、铜矿采冶遗址在漳河流域密集分布,反映了周代这一地区的繁盛景象,也说明这一地区在周代江南的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对铜矿资源的开发可能正是出现这一繁盛景象的动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锦琼副研究员介绍了苏州木渎古城的考古新进展:城址的范围基本确定,城址的布局渐次明晰,城址的时代大体厘清,城址的性质初现端倪。木渎古城更有可能不是未构筑完整的城墙体系,而是在山口处因地制宜的构筑防御设施,利用周边的山体作为天然的城墙,从而构筑起较为完备的防御体系;城址内遗存分布有小聚居、大散居的特点,遗存较多地分布在山前地点;木渎古城所在区域有着复杂的发展演变过程:西周晚期—春秋早期出现

小型城址,春秋晚期出现的大型城址至战国时期继续沿用并有所增益,大量汉代遗存反映了这些城址有可能延续到西汉时期;在有确切文字资料出土之前,尚难以将这座城址与历史上的吴国都城等具体对应,仅能凭借现有的考古资料暂时认为其是一座具有都邑性质的大型城址。

江苏省镇江博物馆何汉生副研究员带来了江苏镇江孙家村吴国铸铜遗址考古工作汇报,对镇江大港吴国遗址群、庄连山墓地的地理位置、布局结构、铸铜遗物等进行了介绍。孙家村遗址处于大港吴国遗迹群中,年代从西周早期至春秋晚期,与吴国的年代一致;遗址的布局完整,外有环壕、土围垄,具有小型城址的格局。对比一些“家庭式作坊”的冶铜生产遗迹,结合孙家村遗址重要的地理位置、特别的构造方式,说明该遗址极有可能是吴国一个重要的青铜器铸造“工厂”。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黄昊德副研究员介绍了绍兴越国王陵及贵族墓考古新收获。目前已明确了绍兴地区贵族墓葬的分布范围,确认了平水盆地为越国大型高等级墓葬的主要分布区;勘探工作厘清了都城与王陵区之间的位置关系及其周边水系,发现王陵区和单个陵园的选址与水系、自然山势密切相关,这对越国陵园制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也为与中原地区同时期诸侯贵族墓陵园制度的对比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这些勘探试掘及抢救性发掘成果对研究越国墓葬等级、礼器制度的形成与演变具有重要意义,也为越国都城制度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参考资料。

江苏省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周保华副研究员从地理位置、发掘工作与收获、遗址结构等方面介绍了南京市高淳区夏家塘土墩遗址。根据该遗址的规模及出土随葬器物推测,这里应为东周时期(春秋早期—春秋中期)墓葬。由墓葬与祭祀堆积的地层位置可知,当时人们是先行祭祀,再堆土挖坑埋葬,最后营造封土。该土墩墓在一墩多墓中发现五座石床墓,这在江苏地区为首次发现,对于研究土墩墓的葬制及当时的政治结构具有重要的意义。该墓中的石床面积较大、铺设规整、规格很高,可能为该地区的领导阶层或统治家族的葬地。

江苏省无锡市文化遗产保护和考古研究所李光日副研究员结合考古工作讨论了鸿山土墩墓环壕的发掘意义与存在的问题。鸿山遗址勘探和环壕的试掘清理,全面地揭露了土墩环壕的形制、层位和尺寸,在土墩墓的考古工作中尚属首

次。土墩墓环壕的这一新发现使人们对土墩墓的认识更加全面,也为土墩墓研究提供新的资料。目前对于环壕的研究尚存在许多问题,需要更深入的研究工作和更多的考古发现。

镇江博物馆许鹏飞副研究员介绍了句容、金坛、丹阳近年来发掘的土墩墓,分别以姊妹桥村东山土墩墓、金坛高庄土墩墓、马家双墩土墩墓为例,依次介绍了发掘概况并分享了收获与认识。这些发掘成果丰富了土墩墓的内涵,对研究土墩墓的形制尤其是堆筑方式有重要作用,而且由于这些土墩墓的墓室形制和出土器物摆放方式各具特点,为以后的土墩墓研究工作提供了新的材料。

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甘恢元馆员介绍了句容城上村遗址考古工作概况,得出如下结论:(1)从新石器时代的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到商周时期、唐宋时期乃至现代,该遗址区域长期适宜于人类居住。勘探及试掘结果表明,自西周以来该区域的生态环境已发生较大变化。(2)城上村遗址西周时期遗存面积大,内涵丰富,且南北两个环壕聚落同时并存,为该区域所仅见。(3)城上村周边已发现的多处土墩墓应与该遗址密切相关,而在居址区发现墓葬这种情况在宁镇地区西周遗址中并不常见。

本次会议上,部分学者还结合自己的研究领域,对相关考古资料进行了系统性分析。苏州科技大学历史系叶文宪教授介绍了近80年以来吴文化的研究概况,并从吴国与越国的城址分析了吴国与越国的对峙。江苏省苏州博物馆钱公麟研究员系统介绍了江苏境内越国遗存,并指出了当前吴越文化研究中值得注意的一些问题。

三、器物研究

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曹锦炎教授从铭文、形制、制作工艺等方面分析了新发现的三件吴王光剑,重点结合文献资料对其铭文进行了细致地释读。三件吴王光剑的剑铭中吴王之名皆是“光逌”连书,三件吴王光剑的文字正好可互相参照。以文献资料为佐证,新发现的三件剑铭作“光逌”,正是名和字的连称。这三件吴王光青铜剑的铭文虽然很短,但对研究吴国历史尤其是吴王阖庐的生平,仍不失为重要的参考资料。

上海博物馆马今洪研究员对上海松江地区先后出土的三件完整的青铜尊进行了详细的解读分析,指出这三件尊具有共同的特点:敞口、高颈、扁鼓腹、高圈足,这类三段式的鼓腹尊在苏、

浙、皖、闽地区皆有出土；纹饰主要有棘刺纹、连珠纹、方格纹、锯齿纹、几何纹等，具有一定的创新性。青铜尊的埋藏环境，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出自土墩墓，作为随葬品；二是发现于窖藏遗址；三是其出土环境有山有水。因此这三件青铜尊的铸造可能与祭山、祭水有关。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苏荣誉研究员针对吴王鉴的风格与工艺提出思考：何谓吴国青铜器？其所属地域、族属、制造者和所有者各有哪些特征？对吴王鉴的风格、工艺、产地进行剖析后可发现其风格特征与某些楚、曾器相同。吴铭文青铜器是王器和王子器，多广泛出土于江河之间，吴地出土并不多，越地出土者甚于吴地。最后，他提出了一些问题供大家讨论：吴国青铜器地域风格的核心是什么？它的风格由谁决定？作为制作者的工匠在风格表现上起到何种作用？青铜器生产的垄断与反垄断，以及其普遍化如何？如何划分青铜器生产区域类型？如何断代？如何讨论礼制？礼崩乐坏的过程和结果如何？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刘延常研究员分析了山东省新泰市周家庄墓地出土吴国兵器的墓葬，包括墓葬形制、棺椁、埋葬习俗、器物组合、兵器组合、墓主身份等，并结合上海博物馆文物保护科技中心对吴国兵器测试分析的认识，比较了其他省份及山东地区其他地点出土的吴国兵器，探讨了周家庄吴国兵器的特点，诸如兵器形制、年代、铸造工艺等，从而对吴国兵器出土的历史背景、铸造工艺、铸造产地及其与越国兵器的差异等学术问题展开思考并得出一定认识。

浙江省长兴博物馆毛波副研究员就南方出土的“王”字和鸟翼形纹铜器，总结了各家的观点，指出目前学术界的争论分歧点在其源流。“王”字和鸟翼形纹铜器起源于吴越地区的越国，但明显受到湘江流域越人青铜文化的影响。鸟翼形纹最早见于春秋晚期，“王”字纹最迟出现于战国初年。越国的“王”字矛与显示身份等级的越王之矛无关，鸟翼形纹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稍后演变出来的“王”字纹的含义应与族属有密切关系，饰鸟翼形纹、“王”字纹的剑、矛可能被赋予了祭祀等与族属相关的功能。

浙江省文物与考古研究所郑建明研究员以

2007年德清火烧山窑址的发掘为开端，针对浙江北部以德清为中心的东苕溪流域原始瓷窑址进行的专题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总结了东苕溪流域原始瓷窑址群特征：(1)出现时间早、持续时间长；(2)窑址密集、生产规模大；(3)产品种类丰富；(4)产品质量高；(5)龙窑成熟、窑具形态各异，装烧工艺高超；(6)独立窑区的形成。东苕溪流域商周原始瓷窑址群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有助于探索瓷器起源、建立先秦时期原始瓷演变的标尺，对于探索越文化、越国的形成、演进及其衰落也具有重要作用。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郎剑锋副教授从山东临淄战国齐墓出土的釉陶甗，讨论了东周时期吴越地区原始青瓷对北方的影响。他首先梳理了其学术背景，然后从临淄釉陶甗的出土情境、形制与装饰特点、胎釉分析以及北方出土东周原始瓷概况与产地等四个方面展开讨论，最后分析产品输出或技术传播的条件、北方商周原始瓷的产地、技术的发明与传承等问题。

新技术的运用也为青铜器的研究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本次会议上，上海博物馆丁忠明馆员从科技分析的角度对五把菱形纹饰剑进行了详细的成分分析介绍，针对科技考古界存在菱形纹饰剑富锡区下凹现象的争议，他提出这是富锡过程中温度较高、保温时间较长、富锡层较厚等条件下热处理过程中形成的下凹。南京博物院田建花副研究员以宁镇地区出土的大量吴国青铜器为样本，通过扫描电镜能谱仪成分分析、金相观察、范铸痕迹观察等技术手段，掌握了它们的合金配比、成型工艺及显微结构、范铸工艺。她认为，吴国青铜容器有其自身的技术传统，而且吴国兵器和容器很可能是两个冶铸体系，技术水平相差很大。该项工作对于研究吴国青铜器的容器群作冶铸技术具有一定的意义。

林留根（南京博物院研究员）、曹锦炎、徐良高、宫希成、周亚（上海博物馆研究员）、王书敏（镇江博物馆研究员）主持了会议研讨，王书敏作会议总结。

（本文由徐秀丽根据会议发言内容及论文摘要执笔整理，未经发言者审阅。）

（责任编辑：王霞；校对：徐秀丽）